

历史源流与民族文化

——“三江并流地区考古暨民族关系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三江并流地区是一块灵息吹拂的地方，历史悠久灿烂，文化多元共存。这里是探古溯源的处女地，在这里，每一位考古学家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探索对象；这里是民族文化的聚宝盆，在这里，民族学每个学科都能找到自己的研究标本。这里的每一项考古发现和民族学研究成果都将是填空补白，令人注目驰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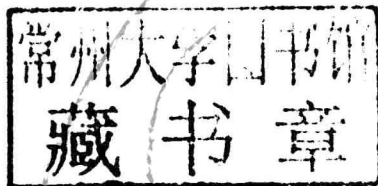
主编 李 钢 李志农



历史源流与民族文化

——“三江并流地区考古暨民族关系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主编 李 钢 李志农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源流与民族文化：“三江并流地区考古暨民族关系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李钢, 李志农主编. —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1
ISBN 978-7-5482-043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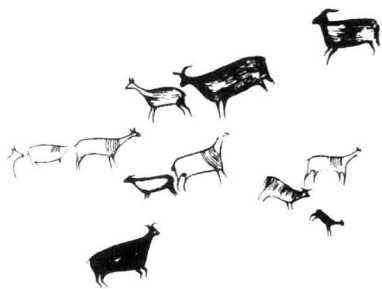
I. ①历… II. ①李… ②李… III. ①民族文化—云南省—学术会议—文集②文物—考古—云南省—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K280.74-53②K872.7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70991号

责任编辑: 张丽华

王磊

装帧设计: 刘雨



历史源流与民族文化

——“三江并流地区考古暨民族关系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主编 李钢 李志农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云南大学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4

字 数: 570千

版 次: 2011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2-0438-1

定 价: 68.00元

社 址: 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电 话: (0871) 5033244 5031071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历史源流与民族文化

——“三江并流地区考古暨民族关系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刘家训 熊正益 何 明

副 主 任 余剑明 浦 江 刘 旭 马文斗

编 委 李志农 杨金华 张跃华 李 钢

和桂华 刘秀芳

主 编 李 钢 李志农





目 录

考 古

民族走廊与三江考古	冯 智 (1)
滇川藏地区的石棺葬与纳藏两族源流	杨福泉 (10)
神话与意义	保罗·巴赫著 张亚莎译 (16)
商代中国西南青铜剑的来源	段 渝 (24)
三江并流地区的石墓与西南夷之白狼人	肖明华 (36)
行走在三江上游地区的石棺 ——浅议三江上游地区秦汉时期的族群	周志清 (47)
三江并流区域河谷两岸少见南诏、大理文化遗存的思考	何金龙 (56)
迪庆藏族自治州的晚新生代哺乳动物的发现和研究历史及其在人类起源 研究中的地位	高 峰 刘建辉 (61)
“海门口类型”青铜文化及族群	王 涵 (65)
关于滇西北地区史前考古工作的两点建议	蒋志龙 (83)
考古在迪庆	李 钢 (85)
石头上的文明 ——浅谈迪庆石刻文物	美德诺·斯郎伦布 (94)
云南三江并流地区史前多元文化概貌	吉学平 (102)

岩 画

略论岩画的照相记录与图像照片制作 ——以马尔康莫斯都岩画1号画面为例	李永宪 (106)
金沙江岩画发现的历程	和力民 (112)
金沙江岩画与我国各地岩画的初步比较	刘 弘 (123)
金沙江岩画与青藏高原岩画鹰图像比较研究	段志诚 (134)

民族关系

民国时期三江并流地区的民族及其关系初探	朱映占 (147)
---------------------------	-----------

从语言现象看多民族地区的民族关系

- 以香格里拉县藏纳关系为例 熊 燕 (156)
- 论三江并流地区民族关系与民族文化变迁 高志英 (161)
- 浅谈“藏彝走廊”西部边缘地区民族格局的基本形成
- 以维西县塔城镇及其邻近地区为例 陈树珍 (174)
- 族际关系演变与民族教育发展关系研究
- 以怒江州福贡县腊乌村傈僳族为个案 史兰兰 (179)
- 中国西南民族关系研究综述 陆双梅 (190)

民族文化

- 云南维西玛丽玛萨人的文化的自觉与重构 李志农 乔文红 方 彧 (201)
- 从族别文化符号到地域文化符号：节日中的民族关系
- 以丙中洛怒族“仙女节”为例 张 跃 李晓燕 谢黎蕾 (210)
- 香格里拉县三坝乡东巴文化现状调查及建议 杨亦花 喻遂生 (225)
- 论唐宋元明时期滇西北三江并流区汉、藏文的传入及应用 潘发生 (243)
- “尔苏历书”小考 徐丽华 (254)
- 东巴文藏音研究 和继全 (278)
- 试述藏传佛教噶举派在滇西北的传播及其贡献 王彦革 (295)
- 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的互动
- 以迪庆塔城启别村为例 和 洪 (302)

茶马古道

- 茶马古道与线性文化遗产保护刍论 木基元 (307)
- 试论茶马古道滇西后路与维西纳西族阿勒古歌的关系 和琼辉 (314)
- 滇藏茶马古道论略 珠玛英追 (323)
- 浅谈迪庆茶马古道及其相关的地名文化遗存 杨秀芸 (332)

文化遗产保护

阿迟目刮：音韵流动的民族史诗

- 从傈僳族歌舞阿迟目刮中的羊图腾崇拜探讨傈僳族源流 刘秀芳 (337)
- 阿怒传统民歌中的藏族民歌 何 林 丁爱华 (342)
- “三江并流地区”民族传统工艺的实践
- 以香格里拉县汤堆村藏族黑陶文化为例 李月英 李晓斌 (357)
- 从维西达摩祖师洞石刻的修复实践看云南藏区石质文物的保护 马 波 (366)
- 怒族服饰文化初探 熊丽芬 (373)



考古

民族走廊与三江考古

冯 智*

一、从西藏考古看滇藏民族文化走廊

当今，如果以拉萨为中心，通过空中航线从拉萨到北京、成都、西宁、昆明和广州，乃至到加德满都都已经变得十分便捷了。而从陆路也有新藏线通乌鲁木齐、青藏线通西宁直至北京，川藏线通成都，滇藏线通昆明，从拉萨还通尼泊尔。这样一种现代的交通状况，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然而，自远古以来，进藏的驿道始终存在，且有自滇、川、青和西域进藏的通道，这种通道总体上可以看做是一条条的民族文化走廊。

研究滇西北及三江流域的古代文明，离不开对包括西藏在内的西南地区的考古研究。从历史的民族走廊出发，考古能够证明各部族和族源的某种相互的联系。凡是研究历史的学者和研究民族关系的学者都比较重视考古资料的研究。尽管对于西藏古代文明及其趋向发展的研究已有大量的汉藏文献资料作为旁证，但是考古资料始终是一种重要的依据。

（一）西藏旧石器文化与中原文明的渊源联系

据考古发现，在西藏地区多处发现的距今 5 千至 1 万年之间的旧石器时代文化^①，表明当时青藏高原有当时已人类活动，西藏旧石器时代的主人无疑就是西藏最早的土著居民。学术界认为：“青藏高原地区仍然是适合人类演化的舞台。”^②“西藏高原及其邻近地区，有可能是从猿到人进化的摇篮。”^③ 西藏旧石器呈现出一定的地方特点，但在

* 作者简介：冯智（藏族），法学博士，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所副所长、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藏学、民族历史。

① 西藏自治区文管会：《西藏自治区文物工作三十年》，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85 页。西藏旧石器地点大体分布在昆仑山脉以南、喜马拉雅山以北、横断山脉以西的广大区域，即东经 80°~92°、北纬 28°~34°之间。

② 贾兰坡：《我国西南地区在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载《云南社会科学》1984 年第 3 期。

③ 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载《文物》1985 年第 9 期。

文化面貌上与黄河流域旧石器具有明显的相同文化因素。如西藏“旧石器的形制，与黄河流域发现的旧石器基本上属于同一个系统”^①。说明西藏和黄河流域的远古居民在文化或种族上已经有了某种联系。

（二）西藏新石器文化反映了不同的民族走廊联系

西藏发现的诸多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与华夏文明关系密切，黄河上游、北方草原等文化体系从不同方向汇集于青藏高原，并与当地的土著文化融合，形成了三元格局的“三大原始文化”^②。它们是：土著文化在主要吸收从黄河上游南下的氏羌系统文化基础上形成的藏东卡若文化；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流域属典型土著系统的曲贡文化；源自华北的细石器文化传统经北方草原地区南下进入藏北高原的藏北细石器文化。

具有西藏地方特色的昌都卡若文化^③中存在大量的中原仰韶文化和南方长江流域考古文化的重要因素。昌都卡若遗址中与仰韶彩陶文化系统中的马家窑、半山等文化在彩陶、打制石器等方面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卡若文化中同样特征的一些打制、磨制石器也大量见于马家窑文化系统中，而具有黄河流域氏羌原始文化系统主要特征的彩陶也发现于卡若文化遗址中。卡若文化无论在石器的类型、制作技术、陶器风格、房屋建筑式样等方面均大量吸收了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半山、马厂系统的文化因素，因而呈现出相似的文化面貌。此外，拉萨曲贡遗址又与齐家文化存在某种联系。^④而藏北细石器文化同样与中原地区的文明有密切联系。在以藏北高原为中心分布着十分广泛的细石器文化。^⑤西藏细石器同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的细石器同属于石叶细石器传统，石叶细石器传统最早起源于我国华北区域。藏北细石器文化“当是承袭了源自华北的细石器传统，而发展成具有地区特点的文化遗存”^⑥。

（三）西藏考古印证滇藏之间的民族文化走廊关系

昌都卡若遗址还与云南大墩子文化系统存在密切的关系。^⑦卡若遗址中的粟来自黄河流域的典型文化因素。^⑧粟是由中原地区沿黄河而上，经甘青地区，一支向西经西域

① 《几万年前青藏高原就有类活动》，载《人民日报》1977年10月9日。

② 石硕：《西藏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对认识西藏远古文明的价值》，载《中国藏学》1992年第1期。

③ 昌都卡若遗址，分为早、晚两期，早期碳14测定年代距今4655±100年—4280±100年，晚期距今3930±80年。参见童恩正、冷建《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及有关问题》，载《民族研究》1983年第1期。

④ 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拉萨曲贡遗址调查试掘简报》，载《文物》1985年第9期；侯石柱：《西藏考古工作述略》，载《中国藏学》1992年第1期。与拉萨曲贡遗址属于同一文化的遗址还有林芝县的六星、红光、居木、加拉马，墨脱县的背崩村、马尼翁、乃东县的钦巴村等共十一处这类遗存。在拉萨曲贡遗址中陶器以泥质磨光黑皮陶最具特色。另外在林芝、墨脱地区十一处这类遗存中发现的磨光黑陶等，是甘肃、青海地区齐家文化中常见的遗物。因此，拉萨曲贡文化与齐家文化存在某种联系。

⑤ 西藏自治区文管会：《西藏考古工作的回顾》，载《文物》1985年9期。

⑥ 安志敏：《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载《考古》1979年6期。该文认为西藏细石器应属于中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早期。

⑦ 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载《文物》1985年第9期。

⑧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产粟的国家，最早的粟发现于新石器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和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二者距今7000—8000年。



进入阿拉伯、小亚细亚；另一支向南沿岷江而下，进入西藏东端横断山脉和三江河谷地区，并由此向南传往东南亚各国。由此推测，卡若文化的主人应是由土著主体居民“与从黄河上游地区南下的氐羌系统居民融合而成”^①。而活动于藏北的游牧文化群体（极有可能是华北细石器传统的一支经过北方草原地区进入青藏高原的一种游牧文化），他们中的一部分从藏北西南端翻越冈底斯山后进入雅鲁藏布江上游和喜马拉雅山地带，甚至越过喜马拉雅山进入印度东北部。另一部分从藏北东南端沿怒江、澜沧江下至藏东河谷地带，与卡若原始群体发生了融合。^②

上述西藏新石器文化时代，西藏地区至少存在与外部文化密切联系的三大原始居民群，即：以从事定居农耕经济兼有狩猎畜牧业为特点的卡若原始群体；以从事定居农业兼有渔业为特征的曲贡原始群体；以从事游牧和狩猎为业的藏北游牧原始群体。这三大原始部落群，在与中原文明发生关系之时，也与周边部落发生了关系，如沿着横断山区和三江流域与今天的云南原始部落发生了文化联系，后来在金属时代出现的共同的石棺葬文化圈，也就是在滇、藏、川包括三江流域地区出现的石棺墓葬等文化特征就反映了这一民族走廊文化联系的史实。

二、从三江考古看与外界的史前文化联系

（一）旧石器时代文化遗迹

西藏境内的考古文化具有旧石器时代文化、新石器时代文化和金属时代文化相传承的连续性特点。而三江流域以滇西北为中心的考古文化与周边考古文化有联系。这一地区也发现了考古学上的三个时代的文化遗迹。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迹代表有“丽江人”及其文化遗物^③，其他还有丽江的木家桥、蛇山等地采集到的一些石器。这些发现大致可以证明滇西北地区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原始人类活动的迹象。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还在迪庆境内（如香格里拉县大小中甸草原西部）被发现。滇西北地区的旧石器文化遗物从类型和制造工艺方面，已经具有我国华北旧石器常见的某些特征。^④而在香格里拉县大小中甸草原和尼西贡页卡发现的古脊椎动物群化石又与元谋人和元谋古猿出土伴生的动物群化石相似，等等，这些例证至少也说明三江考古文化已经与外界古文明有所联系。三江流域地理环境因河流山谷的相对开放性，使古代文明的交往存在相对客观的开放条件，因此，三江地区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在连接青藏高原古文化与云南古文化（如以禄丰腊玛古猿化石文化和元谋人为象征）之间起到过某种积极的桥梁作用。

（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

以滇西北为核心的三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比旧石器时代更丰富，原始居民的活

① 石硕：《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29页。

② 石硕：《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页。石硕：《西藏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对认识西藏远古文明的价值》，载《中国藏学》1992年第1期，第53~63页。

③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丽江人头骨的初步研究》，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7年第15卷第2期。

④ 卫奇、黄慰文、张兴永：《丽江木家桥发现的旧石器》，载《人类学学报》1984年第3卷第3期。

动范围更大。滇西北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布于维西、宁蒗、香格里拉（金沙江沿岸）、宾川、剑川等地。维西县戈登村发现的新石器文化，年代约为距今 4000 年，其上限不超过昌都卡若文化，下限不晚于宾川县白羊村遗址。白羊村遗址年代为距今 3770 ± 85 年。此外，在金沙江两岸发现的大量古代崖画的原始艺术，距今有 4000 年左右的历史，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以滇西北为核心区的三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不仅有广泛的分布和发展，而且影响也广远。三江流域“及其中间的大片地带，在史前时期的新石器时代广泛存在着一种史前文化，其活跃年代在距今 3000 至 4000 年左右，它对东南亚的史前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①。不仅如此，沿着三江流域的自然走廊和古代民族通道，三江文化同样在连接西藏高原古文化与云南古文化的历史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三）金属时代的文化与特点

进入金属时代或青铜时代，滇西北及三江流域的文化已呈现出多元因素的特点。一方面与外界的文化联系的渠道逐渐增多；另一方面无论是青藏高原的文化、甘青地区等北方草原文化，还是云南地区的青铜文化都通过不同的古代通道或走廊相互交往、接触和融合，对三江流域的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藏族古老的原始宗教本教应该最早就是在这—时代从西藏象雄的冈底斯山脉中心地带流传到滇西北三江地区的。

青铜时代，从青藏高原到云南的三江峡谷，从甘青草原到川藏横断山区，从古代滇藏“茶马古道”的传统文化区到“藏彝走廊”古代民族迁徙、融合和交流的文化区，都发现或普遍存在与金属时代文化特点和因素相接近和影响的文化圈，我们给它们命名为金属时代的“墓葬文化圈”或“石棺葬文化圈”。金属时代，在西藏、川西康藏至滇西北的这种文化圈的面貌又有如下情况：

第一，在藏北高原和西藏中部的部分地区发现了石丘墓、大石遗迹和动物形纹饰等文化遗物。而在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流域及藏东峡谷地带发现了一大批吐蕃石棺墓（或称为石棺葬），分布于藏东昌都地区的芒康、贡觉，雅鲁藏布江中、下游的林芝、乃东、拉萨、朗县、加查等地方。^②发现藏北高原的文化遗物大体与藏北细石器的分布范围吻合，年代约为公元前 7—5 世纪。而发现于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及藏东峡谷区域的石棺墓的分布大体也与新石器时代的卡若文化和曲贡文化的分布地带相吻合^③，年代大约是公元前 1000 年到公元前 7—8 世纪之间。说明西藏金属时代的文化均与西藏新石器文化密切相联系，而且是在同新石器文化相互融合基础上发展和演变而来的。因此新石器时代卡若文化和曲贡文化的居民群相互融合演变的后代大概应该成为金属时代石棺墓的主人。

第二，从川西康藏至滇西北的石棺葬分布范围十分广泛。大致包括岷江上游、青花江流域、大渡河流域、雅砻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集中分布于今四川的汶川、松潘、理

① 戴宗品：《永仁菜园子、磨盘地遗址发掘揭开滇西北史前文化面纱》，载《中国文物报》2001 年 9 月 14 日第 1 版。

② 西藏自治区文管会：《西藏考古工作的回顾》，载《文物》1985 年第 9 期。

③ 西藏自治区文管会：《西藏考古工作的回顾》，载《文物》1985 年第 9 期。



县、宝兴、巴觉、德昌、米易以及云南的德钦、香格里拉、永胜、丽江等地，零星的发现于四川的甘孜、石棉、盐源泸沽湖等地。这些地区的石棺葬及其出土的随葬器物大致类似，它们被考古学界认为是同一文化系统的墓葬。^① 石棺葬文化在滇西北地区分布广泛，数量也众多（达上百个点数千座墓）。主要分布于澜沧江流域、金沙江流域的德钦石底、永芝、纳古，香格里拉的中甸克乡、奔东、比虾、雨崩、虎跳峡、江边，丽江茨可、红岩、石鼓、大具、长水等地，出土了大量青铜器、陶器、石器、骨器、贝饰等器物。其年代在春秋战国直到两汉晚期之间，这些文化遗址对于研究当地的族源、民族关系等具有重要意义。^②

三、三江考古文化与民族走廊源流

（一）三江考古文化和西藏考古文化的关系与走向

三江地区处于青藏高原的东南缘，考古学上处于同一时代的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西藏文化与中原文明保持着源远流长的联系，同时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进入金属时代后，藏北高原游牧居民仍然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之间保持着密切的文化交流。而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文化系统则表现为农耕性质为特点的文化。由于西藏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系统与同一时代的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和东部黄河上游的氏羌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因此进入金属时代之后这种渊源关系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延伸和进一步的发展。金属时代的石棺墓是流行于我国北部（东北、华北北部）和西部（甘青地区和横断山区）的一种葬式。甘青地区和横断山区至滇西北的石棺墓基本上属于氏羌体系的居民，从新石器时代以来横断山区氏羌文化因素经过藏东河谷地带向西藏高原渗透的趋势不断得到延伸和发展，因此西藏发现的吐蕃石棺墓在文化特征上与横断山区的石棺墓关系十分密切。西藏石棺墓年代晚于横断山区的石棺墓，其上限约为公元前2世纪，下限延续到吐蕃王朝时期；而横断山区石棺墓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之间（约春秋战国至两汉晚期）。因此吐蕃石棺墓很有可能是从横断山区传入的。^③ 总之，西藏地区的原始文明与中原文化系统黄河上游、甘青氏羌文化和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均有着渊源的历史关系，进入金属时代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和发展。

滇藏之间自石器时代就有文化联系，后来所说的滇藏古老的“茶马古道”文化则是这种文化联系的延续和发展，也体现于经济贸易的交流和两地民族关系的发展，“茶马古道”就是千百年来联系着滇藏两地人民的一条民族的走廊。通过这条走廊，西藏文化在各个时代与云南文化密切交流，而处于中间地区的滇西北和三江流域则受到双方的影响，不断地吸收了双方的文化特点，丰富了自身的文化内涵，成为了今天富有特色的迪庆文化或三江文化的历史源泉。

① 宋治民：《川西和滇西的石棺墓》，载《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3期。

② 童恩正：《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考古发现及其研究》，载《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③ 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载《考古与文物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17~42页。

（二）古代西南丝绸之路与三江考古文化

公元前122年，中国探险家张骞出使西域回到长安，向汉武帝报告说，他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一带）时看见大夏商人从身毒国（今印度）贩运至该地的有两种四川产品，一是邛竹杖，二是蜀布。张骞依据大夏人的描述推测身毒国“去蜀不远”。于是张骞建议汉武帝，另辟一条从四川直通印度的通道。他将这条通道设想为“蜀身毒道”，这就是学术界研究并通称的“西南丝绸之路”。^①当时，蜀通云南的通道主要有“五尺道”（又称“南夷道”）和“旄牛道”（又称“西夷道”）两条交通干线。

汉代的“蜀身毒道”至唐代依然存在，并被充分利用。唐人对这条古道十分了解。唐代樊绰撰《蛮书》称：“从石门外出鲁望、昆州至云南”道（即秦五尺道，汉南夷道）为“南路”；另称“从黎州清溪关出邛部，过会通至云南”道（即古旄牛道、汉西夷道）为北路。据《蛮书》记载，从成都出发，沿途经双流县，蜀州新津县、临邛、名山县、雅州（今雅安）、荣经、嵩州（今西昌）、会川（今会理），渡金沙江，经弄栋（今大姚）、云南城（今祥云）、龙尾城（今下关），至阳苴咩城（今大理）。沿途共经五十一个驿站，计二千九百三十四里。从成都直至云南姚安、祥云，至大理的这条通道正是秦汉以来的“蜀身毒道”的一部分。

吐蕃时期，唐蕃古道从长安出发穿过青藏高原经拉萨、后藏吉隆古道，出吐蕃进入尼泊尔和印度地区，这一古道紧密地连接着吐蕃与唐朝。从唐蕃关系的发展看，吐蕃与唐朝之间不仅仅只有一条通道，而是存在着多条交通联系。其中，沿藏东三江河谷经横断山区进入四川和云南南诏地区有一条重要通道。这条道又分为许多岔道，如通往四川分北道（由松州、维州）和南道（由嵩州、黎州、雅州），任乃强先生认为：“吐蕃初与唐接，自松州始。”^②而进入南诏的路线也分东路（沿金沙江而下经今丽江塔城进入大理漾濞入洱海）、西路（经高黎贡山永昌州进入洱海）和北路（经四川西昌进入云南姚安入洱海）。2009年，笔者参加了由云南藏学研究会组织的“云南藏族历史文化考察”，对上述吐蕃进入南诏的东路和北路进行了考察，我们发现经姚安至大理或由永昌州进入洱海再折至吐蕃铁桥城（或自吐蕃经铁桥城至漾濞和洱海）这一古道存在许多干道，并在沿途发现了一些重要的古文化信息和这条古道交通的遗址，它们对于进一步研究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的分流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应该说，由于西南丝绸之路进入三江流域分道的存在，或由成都经云南进入三江流域这一民族通道的存在，从新石器时代以来，蜀文化、滇文化就已经广泛地流传到了金沙江峡谷等三江流域，这从三江流域新石器时代以来的考古发现及其遗物与自成都至大理的“西夷道”或“旄牛道”沿途的考古文化遗物进行对比就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三）藏彝走廊与三江文化的多元发展

滇西北是三江流域的核心地区，三江流域是康巴地区虽边缘却具有文化特色的地

^① 江玉祥：《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第二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1页。

^② 任乃强：《羌族源流探索》，载《民族研究通讯》1980年第1期。



区,甚至是康巴文化的摇篮。而康巴是一个自古以来多民族、多文化不断交融和发展的地方,因为康巴就处于“藏彝民族走廊”的主题区域。汉代的司马迁在《史记》中认为此地民族众多,难以分辨,“君长以什数”,民族“皆氏羌”。据文献记载,春秋战国以来至唐以前,这一走廊并靠近三江流域的地区曾出现过氐羌、笮、白狼、牦牛羌、多弥、东女、附国、党项、苏毗、南诏、白兰、吐谷浑等部族。这些部族经过长期的交往、融合、迁徙和发展,逐渐形成了今天居住于这一走廊的汉、藏、土族、羌、蒙古、彝族、纳西、傈僳、白族、独龙族、怒族等十多个民族。

三江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正是受到这一走廊多民族的流动和融合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元代忽必烈南征大理也经过了这一民族走廊。而从新石器时代以来,或至少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甘、青一带的古氐羌人就南下沿着横断山区包括三江在内的各条江河向南、向西迁徙。著名藏学专家格勒博士就认为:氐羌系统的“六牦牛部”约在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进入了西藏。其迁徙路线是:甘青→阿坝茂汶→雅安宝兴→汉源→石棉→木里→沿雅砻江而上→雅江→甘孜→石渠→进入金沙江流域→沿金沙江而下→白玉→巴塘→德钦(云南)→进入澜沧江流域→沿澜沧江而上→芒康(西藏)→向西经察隅进入雅鲁藏布江流域。而这些地区又是石棺葬分布的区域。^①因此学术界认为“石棺葬文化系来源于北方的羌人文化”^②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格勒博士的研究也充分说明三江考古文化是深受“藏彝民族走廊”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民族迁徙、融合和发展的历史所影响的,因而使以滇西北地区为中心的三江流域文化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

四、由三江考古文化研究引发的思考

(一) 三江考古文化的历史和文化地位

滇西北及三江流域处于滇、藏、川大三角交汇地带,是古代西南丝绸之路辐射的区域,也是几条民族走廊(滇藏民族通道、藏彝民族走廊和西南丝绸之路)的交汇地区,因此,历史和文化区位突出,并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唐代,唐王朝、吐蕃和南诏在滇西北及三江区域交汇。自元朝以来,滇西北及三江地区进一步成为历代中央王朝势力进藏的重要咽喉之地,同时也是历代中央王朝用兵西藏和经营藏区的一个大营盘。清代以来的“改土归流”政策和近代以来的“治藏必先安康”等策略又首先在滇西北藏区推行,为中央王朝全面治藏提供了先行经验。“民国”以后至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滇西北包括藏区在内的三江流域各族人民爱国力量不断壮大;各族人民积极支援红军北上抗日;抗日战争时期滇藏“茶马古道”发挥了巨大作用;滇西北藏民骑兵大队为新中国的建立和边疆的解放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三江流域各族英雄儿女投身于西藏的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运动,

^① 格勒:《论古代羌人与藏族的历史渊源关系》,载《中山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② 沈仲常、李富华:《关于石棺文化的几个问题》,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大会讨论文集》,转引自杨福泉著《纳西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17~18页。

为伟大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贡献……

（二）三江考古文化形成了三江文化丰富的内涵和特点

三江考古文化具有博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正如格勒博士认为：早在新石器时代，北方草原游牧的“胡”族群和文化系统，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系统和氏羌族群系统，长江流域的濮越百族系统，在横断山区相遇、相重、相融，形成多样性、多重性特点。^① 这里所指的几大文化系统在“横断山区”相遇，在地域上完全包括三江流域在内。正是几大文化系统和民族走廊在包括三江流域在内的横断山区会合和交往，在文化上“形成多样性、多重性特点”。这种特点又帮助三江民族培养出了一种大思想、大战略和大智慧的视野。对此，原迪庆州委书记齐扎拉同志作了精辟总结，他认为：康巴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和谐、勇敢、大气、开放。和谐是人与大自然、人与人、人的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和谐；勇敢是在历史长河中锻炼出来的不畏艰难的气质；大气是在民族交往之中形成的文化的包容性和多样性；开放是处在茶马古道必经的位置，相对于其他藏区有较为频繁的对外交流”^②。这些基本内涵和特点是三江文化的精华，也是三江各族人民共有的财富，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民族优良传统。

（三）三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任重道远

滇西北及三江文化由于地理的特殊性和独特的历史文化的地位所决定，形成了丰富而别具一格的历史文化资源，它们包括新旧石器时代文化、石棺葬文化、草原文化、峡谷江边文化、古老的东巴文化、本教文化、藏传佛教文化直至香格里拉文化。此外还包括独具地域特色的建筑、民间文学艺术——中甸锅庄舞、德钦弦子舞、维西塔城热巴舞以及流行于迪庆的山歌“央”、游戏“情卦”、藏戏、尼西情舞、中甸茶会歌、《格萨尔》说唱、赞词演讲、神山崇拜习俗、筑墙歌等等，总之，三江流域有着丰富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遗存，是三江各族人民共同的传统资源。

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如何继承、保护、开发和弘扬，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研究的课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外来文化的冲击、旅游市场的活跃，以及“走出去，请进来”的经济和文化交流，部分民族文化特点逐渐淡化，有的部分又融入了新的因素，这些都是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中出现的正常现象。我们既要尊重历史，又要积极创新；既要保护民族的文化特色，又要充分吸收其他民族甚至是世界的先进文化。建塘镇古城“茶马古道”重镇的修复是我们对历史文化资源的进一步重视和面向社会发展的进一步开发，也是对历史的尊重和对传统文化的有效保护。如同古城的修复和保护那样，无论是规划建设、开放景点，还是进行文化资源的利用，都需要重视民族特色、历史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

^① 泽波、格勒：《横断山民族文化走廊——康巴文化名人论坛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8月版，第5页。

^② 齐扎拉：《论康巴优秀文化保护和弘扬》，载《横断山民族文化走廊——康巴文化名人论坛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8月版，第17页。



在此，对当地传统文化资源的修复、保护或是开发、利用，三江流域的教育都应该是各项事业的基础，以教育推进发展，并进一步重视人才建设和学术研究，如三江考古研究还需要后继有人。对三江流域历史文化资源的诠释，要适应形势的发展，大量地依托于国民教育和民族教育的普及和发展，按照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有关权利，各级政府在重视汉语，甚至是外语学习的同时，要加强民族语言文字的普及和使用。在大量地培养现代专业人才的同时，大量培养懂得汉藏等民族语言文字的双语人才，推动地方的藏学研究的深入开展，为三江流域的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提供智力支持，推进三江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

滇川藏地区的石棺葬与纳藏两族源流

杨福泉*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我国西南地区从川西北的岷江流域起,西至西藏昌都一带,沿横断山区发现了一批连成一片的石棺葬。其时代大致从春秋战国到秦汉为止。多数学者认为这种文化的创造者是古氏羌人。如童恩正先生在其论文《近年来中国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中说:“如果从大族系讲,我们将石棺葬文化视为北方循康藏高原东端横断山脉的河谷南下的氏羌民族的文化,可能不致大误。”^①“石棺葬文化系来源于北方的羌人文化。”^②川西和滇西北石棺葬的分布范围包括岷江上游、青花江流域、大渡河流域、雅砻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分布在四川岷江流域的汶川、松潘、理县;四川宝兴县、巴塘县、茂汶县西部安宁河流域的越西、冕宁、喜德、西昌、昭觉、德昌、米易和云南的德钦、永胜、丽江等地的石棺墓,都是用石板、石块筑壁,石板盖顶,而不用石板或石块铺底。这些墓出土的随葬器物基本相同,故它们被考古学界认为是同一文化系统的墓葬。^③零星的发现还见于四川的甘孜、石棉、盐源泸沽湖等地区。^④

这些古氏羌人大约从春秋战国时就从甘肃、青海一带南下,沿横断山区的各条江河向南、向西迁徙。藏族学者格勒指出:如果这种看法正确,那么“六牦牛部”进入西藏当是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迁徙路线为:甘、青→阿坝茂汶→雅安宝兴→汉源→石棉→木里→沿雅砻江而上→雅江→甘孜→石渠→进入金沙江流域→沿金沙江而下→白玉→巴塘→德钦(云南)→进入澜沧江流域→沿澜沧江而上→芒康(西藏)→向西经察隅进入雅鲁藏布江流域。上述地区均有石棺葬出土。^⑤

* 杨福泉,博士,研究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云南大学博士生导师。

① 童恩正:《近年来中国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载《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② 沈仲常、李富华:《关于石棺文化的几个问题》,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大会讨论论文集》。

③ 宋治民:《川西和滇西的石棺墓》,载《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3期。

④ 安志敏:《四川甘孜州附近出土一批铜器》,载《考古通讯》1958年第3期;石棉县文化馆:《四川石棉考古调查》,载《考古》1982年第12期;黄承宗:《泸沽湖畔出土文物调查记》,载《考古》1983年第10期。

⑤ 格勒:《论古代羌人与藏族的历史渊源关系》,载《中山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格勒先生在此没有把在今纳西族聚居最为集中的云南丽江地区境内发现的多处石棺墓葬统计在内，但从上述地区就看得出，这些地区也是纳西先民广泛聚居的地方。如果说这种石棺葬文化与“牦牛部”有关的话，同为藏族和纳西族先祖的“牦牛羌”所具有的这种葬俗，无疑与藏族和纳西族都有密切的关系。

如上所述，石棺葬在西南地区分布很广，特别在现在藏族和纳西族聚居的川西南和滇西北地区，多年来不断发现石棺葬，如四川的木里^①，云南德钦的永芝、纳古^②等藏族和纳西族聚居的地方，近年来均相继发现了石板墓。年代略有早晚（德钦的纳古石板墓的年代经放射性碳素测定为距今 2900 ± 100 年）。^③

丽江金沙江河谷的纳西族地区也处于这种石棺葬的文化圈内，分别在丽江市境内的大具乡、石鼓镇至巨甸乡一带的格子、红岩、丽江坝长水马鞍山山麓，这些地方皆发现了石棺墓。其中，在属于石鼓镇的格子村发现了大量的石棺葬，云南省文物考古队经过考察该村地理环境、墓葬的分布状况和墓中出土的青铜器等以后得出结论，这里的石棺墓属于战国时期的墓葬。这里依山傍水，地势较高，背后又有取之不尽的板岩石，为古人修建石棺墓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从石棺葬墓地的密集程度看，这里至少有一两千座石棺墓，可以肯定这是居住在这一带的一个较大氏族的公共墓地。^④

滇西北最早记载有石棺葬的汉文史籍是清朝乾隆八年（1743 年）编纂的《丽江府志略》，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石鼓（今丽江市石鼓镇）之山，峭拔耸秀，又有长江迎面朝来，昔有人谓此为牛眠吉地，欲移防汛衙门于其处，方平基锄地，下有石棺。启石棺再挖，有方铜钉一茎，宽五寸余，挖深至五六尺，此钉不可动摇，遂惊为神异，覆土瘞之。”^⑤

目前，西藏所发现的石棺葬绝大多数集中分布在由川滇西部高原进入西藏的主要通道的沿线范围。“茶马古道”（亦即今滇藏公路和川藏公路沿线）就正好是沿着这一通道行进的。由石棺葬可以证明，以昌都为枢纽的“茶马古道”路线很早以来就是一条今藏、川、滇三地原始居民进行沟通往来的重要通道。这条通道被开通的历史，从考古发现看，至少可上溯到距今 4 000 至 5 000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更早。

2002 年，我参加滇川藏三省联合的“茶马古道”考察队，经过德钦县佛山乡纳古行政村梅里石村，这里有 18 户藏人。过一座桥后，有一条小路转往左面的梅里雪山，这是过去“茶马古道”进藏的必走之路，因此又称梅里路口，从这里赶马 7 天，就可到西藏昌都地区左贡县（索拉丫口），过弥都（miq tvi）丫口（“弥都”意为鲜花）。这里亦是转卡瓦格博雪山“外转经”的出口（外传经一般转 15~30 天），外转山之后，由此处出来。

我们到了佛山乡纳古行政村，我这是第二次来纳古了。因同行的有来自四川大学的

① 黄承宗：《木里县发现石棺葬》，载《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80 年 1 期。

②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德钦永芝发现的古墓葬》，载《考古》1975 年 4 期。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德钦县纳古石棺墓》，载《考古》1983 年 3 期。

③ 考古研究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八），载《考古》1981 年第 3 期。

④ 李锡：《格子石棺墓地考查见闻》，载《丽江志苑》第 2 期，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1988 年版。

⑤ 乾隆版《丽江府志略》，丽江市纳西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 1991 年翻印，第 339 页。